

临汾方志丛书

李天太 主修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临汾

家教

林宏跃 编著

# 臨汾宗教

寅生書



林宏跃 编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 临汾方志丛书

主 修 李天太

副 主 修 苗元礼

主 编 邵玉义

执行主编 冯彦山

编 辑 郭夏娥

## 总序

任建新

临汾古称平阳，属古冀州。这里是物华天宝之地，人杰地灵之邦；这里是中国之根，中华民族之源。部落联盟方国兴起时，古冀州位居中心，尧舜禹划九州而治天下，古冀州因处九州之中而称“中国”。《史记》载：尧禅让于舜，舜“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故而“中国”称谓源出古冀州。始自尧舜，建都平阳。平阳在中国历史上，独领风骚，地位独特，实为华夏文明最为璀璨耀眼的明珠。难怪史学界有如此评说：三十年看深圳，一百年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长安，五千年看平阳。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平阳先后为郡、州、府、路治，辖区范围适各朝之需或大或小。作为府治，始于宋政和六年（1116年）“领县十治”，至明清时期，“领州六、县廿九”，即辖今之临汾、运城两市及晋中市的灵石、吕梁市的石楼两县。清末平阳、蒲州两府分治。民国初属河东道，后废道直属山西省。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运城、临汾合并为晋南地区，1970年临汾与



运城分治。2000年撤地设市，改称临汾市。临汾市东倚太岳，西临黄河，南接运城，北邻晋中，汾水自北向南穿过。全市面积20275平方公里，人口413万人，辖管17个县（市、区），市府设在尧都区。

在临汾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不仅物产丰富，素有“煤铁之乡”、“棉麦之乡”的美誉，而且还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景观，成为令人瞩目的旅游资源大市。全市现有古迹名胜2594处，其中国家级13处，省级51处。10万年前的“丁村人”活动的遗址，2400多年前晋国遗址与侯马“盟书”，600多年前洪洞大槐树明代移民遗址；壶口瀑布、姑身仙洞、陶唐峪、悬泉山、龙澍峪、龙祠泉；尧庙、广胜寺、小西天、东岳庙、大云寺、大钟楼、霍州署、苏三监狱、元代舞台……它们正以其自身的魅力和特色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游客。

在临汾这块钟灵毓秀、藏龙卧虎的土地上，曾孕育了不计其数的帝王将相、治国英才、文坛巨匠、学者名流。中国第一贤帝尧，春秋时代的霸主晋文公，战国之际的著名思想家荀子，“完璧归赵”的外交家蔺相如，名噪史册的政治家赵盾、狐偃、霍光、贾逵、贾充、邓攸，声震一时的巾帼英杰卫皇后、平阳公主，舍亲子而救赵盾后裔的义士程婴，叱咤风云的军事家卫青、霍去病，早于玄奘二百年赴印度取经的旅行家、翻译家高僧法显，宋代理学先行者、学者孙复，“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著名音乐家师旷，国画大师朱好古，天才神童卢秉纯……他们的业绩，彪炳日月，辉耀山河。

临汾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汉族民俗风情的发祥地，中西宗教文化传播聚会的圣土，尤其是中国书画、戏曲、民间传说、故事、歌谣、民间工艺、社火、鼓乐艺术的宝库。闻名中外的平水雕板及其“四美图”，名扬五洲的威风锣鼓，以及剪纸、踩跷、面塑、舞龙灯、雄狮登天、蒲剧、眉户、皮影、道情……所有这些都是文苑之精华、艺海之珠玑，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

中的珍品。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我国历朝历代多有修志的传统，编纂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时届全新世纪，欣逢临汾撤地设市，平阳大地一派生机盎然。为了向世人展示古老临汾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提高临汾对外的知名度，激发临汾人对家乡的自豪感和建设美好家乡的坚定信念，临汾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了以临汾史话、帝尧、历代人物、山水名胜、民间艺术、民俗、方言等内容的《临汾方志丛书》，这无疑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大好事！

我的故乡是临汾，我的根在临汾，桑梓情深，自然对家乡怀着一种特殊的赤子之情。在《临汾方志丛书》付梓问世之际，临汾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嘱我写序。愿《临汾方志丛书》在新世纪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为把临汾建成一个经济强市、文化名市发挥积极的作用。

2005年10月24日



## 序

宗教曾经是人类文明成长的源泉，宗教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内容。临汾宗教文化是反映临汾文明发展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窗口，因此系统揭示临汾宗教文化状况，对全面认识临汾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特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临汾市位于山西省南部，是古帝尧的都城之地，现辖区包括：尧都区、霍州市、侯马市、洪洞、古县、安泽、汾西、永和、隰县、大宁、吉县、乡宁、蒲县、浮山、襄汾、翼城、曲沃。临汾宗教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从旧石器时代末期直到近现代，源远流长，而且在中国宗教文化发展史上闪动着许多迷人的个性色彩，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

临汾大地作为中国原始人类起源和成长的摇篮之一，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同时也赋予了她在中国本土宗教文化成长上的重要地位。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研究表明，宗教的历史和人类文化史一样久远，宗教意识的产生曾经是人与动物的分界之一。在原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在原始文化发展的早期，它曾被包裹在原始宗教之中，可以说原始宗教是原始文化早期社会，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化始终是彼此不分、混沌为一的，原始文化是在原始宗教的母腹中孕育、躁动、发育和成长的摇篮。临汾在原始社会时期，经历了从襄汾丁村人、吉县柿子滩人到尧都平阳的漫长历史



发展，在这个中国由蒙昧洪荒时代迈向文明时代的重要历史进程中，临汾原始宗教文化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迹。我们可以说，临汾是中国原始宗教的重要发祥地，这里有中国目前最早和最重要的原始宗教文化遗存，在中国原始宗教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夺目动人的光彩。

在临汾市吉县柿子滩，考古发现了距今1.5万—1万年前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上的两方岩画，一方为裸体女神性形象，另一方为两种动物形象的图画（鱼鹿交会图），含有生殖崇拜等远古宗教活动与思想内容。这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宗教岩画，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宗教文化艺术创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早的宗教活动场面，在这里我们或可追寻中华之母——女娲造人宗教神话传说的历史源头。翼城北捍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彩陶上的玫瑰花图案，透露出距今7000—6000年氏族社会部落图腾崇拜的宗教文化气息，它是华夏之“华（花）”的文化象征。在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大型墓葬中出土的彩绘蟠龙陶盘，表明了在距今4500年左右中华民族以龙为图腾崇拜对象的宗教观念和民族文化的初步形成。在襄汾陶寺龙山文化中还出土了主要用于祭祀活动的木制彩绘鼉鼓、特磬、土鼓、陶埙、陶铃、铜铃等6种26件礼乐组合器物，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同一遗址出土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礼乐器物，表明它是中国礼乐祭祀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由金属乐器与石制乐器组合而成的“金石之乐”的源头，因此可以说临汾又是中国祀典礼仪的滥觞之地。

临汾又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最早的神仙世界所在之地，临汾道教在中国道教发展历程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影响。成仙是道教修行的目标，道教的神仙不同于传说中的一般鬼神，不是生活在冥冥之中的精灵，而是现实个体生命的无限延伸和直接升华，其最大的特点是形如常人而能长生不死，逍遥自在，神通广大，不食人间烟火。神仙形象来源于神话传说，神话传说是早期道教形成的主要思想来源，而神仙形象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庄子》中关于神人、至人、真人的文字是对神仙形象的最初描述，同时也初次描述了一个神仙世界。

《庄子》的《逍遙游》篇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又说“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喪其天下焉”。这就是说，高远广大的姑射山是神人们居住的地方，这里的神人个个肌肤如冰雪一样洁白，身姿容貌如少女一样青春美丽，他们吸清风、饮甘露，不食五谷杂粮、人间烟火，乘坐云雾而行，驾御神龙而飞，周游四海，逍遙自在，并且具有使人间不受灾害侵扰而五谷丰登的神力。即便是能够让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的堯王也十分向往这个神仙世界，他去姑射山拜会了王倪、啮缺、被衣、许由四位神人之后，感到自己的能力实在是无法与神仙们相比，甚至因此生出些许自卑，萌发了离世归隐之心。

姑射山就是临汾尧都区西南25公里处的广袤山区，为吕梁山支脉。《庄子·逍遙游》将其同吕梁山一体共视，以“藐”形容，取高远广大之义。又由于姑射山位于汾河之滨，近于尧都平阳之地，所以才有帝堯往见四神人之说。因此，我们可以说临汾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最早的神仙世界的所在地。后世姑射山的仙洞沟地区，不仅风景秀丽宜人，而且依然是临汾道家道教宗教文化传播的中心区域。也许是得力于姑射山的仙风吹拂，临汾大地人杰地灵，神人高道“仙踪”不断。五帝传说之时临汾有采食长寿之药的不老神仙偓佺，汉文帝时有结茆曲沃河畔的隐仙河上公，唐朝有著名的高道洪崖子，明代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疯癫道士张三丰。

自东汉道教传入临汾以来，在北魏寇谦之倡立新天师道教于平城（山西大同）并使其成为国教的推进下，临汾道教香火日盛。在隋末李唐创业过程中，白衣道士在霍州假扮太上老君的使



者——霍山之神，制造了著名的“霍山神话”，它适时地与李唐王朝的政治需要相呼应，不仅为李渊起兵反隋祭起了天佑神助的大旗，大大增强了政治号召力，而且有力地帮助了李渊顺利南下灭亡隋朝统治。唐初，吉善行制造了太上老君在浮山县羊角山显圣的“羊角山神话”，将太上老君与李唐王朝以亲属关系联系起来，为刚刚建立的唐朝政权披上了“君权神授”的神圣外衣，对于巩固新兴政权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促成了李唐王朝将道教奉为国教。唐玄宗曾经率皇室贵族和群臣200余人驾临浮山县龙角山祭祀，龙角山更被李唐王朝公认为“神山”、“圣山”、“祖宗山”，岁岁祭祀，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时之间成为全国道教圣地。可以说，临汾道教为神化李唐王朝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大贡献，大大提高了中国道教的社会地位。

宋与金、元对峙之际，临汾社会相对安定，手工业发达，以“平水版”为名的发达的刻书业风行全国。这一时期，新兴起的北方新道教、特别是全真教在临汾十分活跃，道教内丹南宗始祖紫阳真人张伯端也在临汾留下了踪迹。金元之际，临汾成为全真教的名流荟萃之地。全真教七子门下的孙志坚、尹志平、宋德方等都在临汾长期活动，孙志坚是把全真教从临汾推向全省的关键性人物，尹志平是后来全真教掌教。曾受业于全真教七子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三真门下的宋德方，秉承其师丘处机遗愿，借临汾刻书业的便利，携弟子秦志安、何志渊、毛素养等诸多道教高才在平阳玄都观汇校刊刻道教传世经典与全真教典籍，从元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年）至乃马真后称制三年（1244年），前后共历八年之久，刊印出道教典籍《玄都宝藏》（又称《元道藏》）7800多卷。明朝编修的《正统道藏》，所据底本以《玄都宝藏》为主。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道教全书《道藏》，又是在民国时涵芬楼影印北京白云观收藏的残缺本《正统道藏》基础上经过补充整理而成的。这一时期，临汾大有成为全国全真教中心之势。姑射山的仙洞沟地区，在道教势力的培植下宫观建筑大肆

兴建起来，成为临汾道家道教宗教文化传播的中心区域。同时，属于北方新道教的真大道教五祖邴希诚、九祖张清志都长期在临汾进行传教，八祖岳德文还是临汾翼城县人。

元宪宗八年（1258年），全真教与佛教在元宪宗御前争辩正统宗教地位失败以后，道教开始衰落，特别是在元至正以后道教的一些典籍被焚毁禁传，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临汾的道教势力开始变得衰弱。明清时期，临汾道教已经十分衰微，但仍然有张三丰、刘一明这样全国知名的道教活动家、理论家，在道教内养修炼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不过终究已是强弩之末，很难挽回道教发展的颓势。

如今临汾保留下来的较为完好的道教宫观虽然已经不多见了，但如蒲县东岳庙那样融宋、金、元、明、清建筑为一体的道教宫观在全国仍属罕见，多种宗教建筑风格共相争辉，绚烂夺目。庙中以“十八层地狱”为题材的真人般大小的彩塑也是明代雕塑艺术的珍品。

临汾还是佛教在中原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这里诞生过西行求法第一人法显和“默照禅”禅宗的创始人正觉，保存下来的佛教建筑和文艺创造、特别是《赵城金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丽珍宝。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原地区，当时仅限于宫室。直到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58—75年）仍主要流传于长安、洛阳两京之地，信仰者也大多是皇室贵族和达官贵人。临汾地近西汉故都长安与东汉京师洛阳，在两京僧人和信教者传播影响下，成为佛教传入中原最早的地区之一。1983年，文物工作者在襄汾县普净寺发现了明成化元年（1465年）的佛教残碑，可知普净寺的前身“南史寺”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年）前后，表明佛教开始在中原地区传播的最早时期就已经传入临汾，佛教进驻临汾大地距今已有1920多年的历史。

东汉明帝永平以后，五台山逐渐成为佛教在内地除两京以外最早的重要传教基地，往来于两京与五台山之间的佛徒渐渐多起



来。临汾处于两京与五台山之间的交通要道，在往来僧人沿途传教的影响下，佛教影响更为扩大。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僧人在霍山南麓创建了俱卢舍寺（今洪洞广胜寺下寺前身）和休粮寺。

由于东汉以来佛教文化的长期影响，东晋十六国时期，山西出现了一批佛教高僧，如慧远等人，在全国佛教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临汾也涌现了高僧法显，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翻译家和旅行家，是我国西行求佛取经到达过中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29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个人，比唐玄奘西天取经早260年。法显和纪录他旅行见闻的传世之作《佛国记》，在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与宗教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地位，是佛教和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净土宗的宗教学说在临汾民间得到广泛信仰。唐朝中期以后，佛教禅宗在临汾影响较大。南宋时期，佛教禅宗高僧隰州（今临汾市隰县）人正觉（1091—1157年）创立了新的禅宗派别“默照禅”，江南地区信仰者如潮，在佛教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可谓是当时的禅宗泰斗。

洪洞广胜寺保藏下来的佛教藏经金代赵城《大藏经》（又称《赵城金藏》、《赵城藏》、《金藏》），是历代雕刻刊印和保留下来的汉文大藏经中最古老最完整的世界孤本，是我国宗教和文化史上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领导成立的、由任继愈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就是以《赵城金藏》为主要底本而加以补充校勘，修成了我国历史上卷帙最多、内容最全面的汉文佛教经藏《中华大藏经》的正编，并于1984年陆续出版，堪称宗教界、文化界的一件功载千秋的幸事。《赵城金藏》对汉文《中华大藏经》的编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抗日战争中，为了阻止日寇掠夺这部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共中央和八路军临汾地方武装以及广胜寺僧人李空等还联袂演绎了保护国宝的动人爱国故事。

元宪宗以后，临汾佛教的势力逐渐超过了道教，道教的一些宫观被佛教挤占，加之明清三教融合局面的形成，佛道共居一处庙宇而又和睦相处的现象并不少见。但总体来说，明清时期佛道二教都受到来自民间秘密宗教的冲击，社会影响力相对下降，处于日益衰落之势。临汾现存的佛教寺庙建筑，大多都是这一时期重修和新建的，其中不乏在宗教建筑和艺术方面颇有价值的经典之作。如广胜寺元代建筑的技巧，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独具一格：为了扩大殿内空间，大量减少殿内柱子数量，增大了梁架跨度，其中有的内柱竟然既不设在梁缝之下，又不与前后檐柱相对照，而是设在梁柱之间，五间大小殿宇的殿内竟能少到只用两根柱子（下寺前殿），真是大胆而又充满智慧的创造；梁架承重构件可以不用平置的梁袱，而用大叉手式的爬梁构成一体，共同承受屋檐重量，这种高超的建造技艺，在我国建筑史上可谓独辟蹊径。广胜寺水神庙元代壁画，广胜寺琉璃飞虹塔、小西天彩绘悬塑、大云寺琉璃塔等在造型和绘画艺术上都别具风采，颇有艺术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

此外，临汾社会文明在发展历程中曾经受到多种多样宗教的洗礼和血与火的考验。其中，既有来自于中国本土的名目繁多的民间秘密宗教，又有明清之际来自于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还有源于阿拉伯世界、随着19世纪回民的迁来而传入临汾的伊斯兰教。

临汾是天主教、基督教在山西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在西方列强的入侵过程中，伴随而来的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有的在临汾进行了赈灾救济、兴办学校教育和医疗事业等活动，客观上对临汾学校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的历史作用。

天主教在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传入山西，第二年就传入洪洞和临汾（今尧都区）兰村，而基督教传教士的足迹也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踏进了平阳大地。光绪三年（1877



年)前后在遭遇严重干旱后,临汾发生了丁丑奇荒,人们甚至易子而食。光绪四年(1878年),基督教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受托来山西赈灾,对临汾严重的灾害与社会状况进行考察后,他委派李修善等外国传教士来临汾赈灾传教,将募集到的10万两山西赈灾款的一半发放给临汾所在的平阳府,对缓解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的临汾人民的痛苦起到了一些作用,爱憎分明的临汾人民在城内为李提摩太树起了“德政碑”。据不完全统计,光绪六年(1880年)以来,基督教、天主教先后在临汾兴办过的中小学校、神道学校、医学班大约有30多所,其中中小学学校有24所之多,首开临汾现代教育之风。光绪七年(1881年)前后,卫理森在临汾开办基督教教会医院(后改建为善胜医院),以其先进的医疗技术在临汾久负盛名,至今依然存在,它所培养的医疗技术力量为临汾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后,临汾主要成为基督教内地会的传教势力范围,发展迅猛。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先后来于英国、美国、意大利、荷兰、丹麦、挪威、瑞士、澳大利亚等八九个国家,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但基督教、天主教在临汾发展过程中,有的依仗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傲慢强横,干预民政,致使普通民众与教民的矛盾加剧,埋下了民教仇恨的种子。由此,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风暴中,临汾成为山西南部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的中心,掀起了反洋教运动风潮。期间,临汾各地纷纷发生烧毁教堂、仇杀传教士与教民事件,至少有四名传教士在义和团反洋教运动中丧生。

明清以来,临汾的民间秘密宗教十分活跃,先后有白莲教、圆顿教、天理教、在理教、油腊教、金丹教、桥梁教、无为教等,还有独见于临汾地方史志的哈哈教。近现代时期,民间秘密宗教还有义和团(拳)、红灯照等。秘密宗教曾发动了大规模反清武装斗争,如哈哈教起义、曹顺天理教起义等,产生了重要的

历史影响。声势浩大的临汾各地义和团运动，是民间宗教发展的高峰。另外，近现代以来，在传统的秘密宗教影响下，临汾还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带有宗教色彩的会道门。虽然这些会道门中有少数曾从事过诸如抗日等一些有利于民族利益的活动，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还转化到革命队伍中来，如安泽县的红枪会等，但绝大多数会道门都从事着蛊惑百姓、骗取民财、扰乱社会的危害活动。如洪洞一带的会道门从近现代兴起，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不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会道门就是如此，这些会道门如今基本上已经被依法取缔肃清。

总之，临汾宗教在过去的岁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提出了许多需要理性思索的问题。与时俱进，用科学的世界观和发展观对待宗教文化，发挥其在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将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